

抗日救亡的嘉定文化

陶继明

嘉定的抗日救亡文化活动分两个历史阶段。1931年9月18日的“9·18”事变至1937年7月7日的“7·7”卢沟桥事变为第一阶段；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全面胜利为第二阶段。

—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9·18”事变，东北三省沦陷。激起了嘉定人民义愤填膺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一个星期后，在爱国民众的强烈呼吁下，嘉定县各界在公共体育场（今嘉定体育馆）举行“对日外交民众大会”。决议电请中央政府当机立断，厉行革命外交，收回日本在华一切权利。同时通电全国一致反日，共图救国。大会结束后整队游行，分头演讲，各乡镇也纷纷召开民众大会。嘉定县抗日救亡的文化活动由此拉开序幕。

奎山民教馆一马当先

嘉定县奎山民众教育馆（简称奎山民教馆），系一个主管文化体育的事业单位，组织举办了一系列抗日宣传活动。

1931年12月1日，奎山民众教育馆举办国货陈列会，大力提倡国货，提倡民族工业产品，长民族志气。同时，还搜集了抗日图画近200幅，12月6日起，在孔庙明伦堂举行

抗日图画展览会，“使民众对于暴日强悍之行为及欺侮我国之情形，有深刻之印象，谋抵制之方法”（《嘉定县文化志资料汇编·大事记》）

1932 年 1 月 1 日，奎山民教馆组织嘉定县各界人士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抗日宣传演讲大会，夜间举行提灯会；1 月 2 日、3 日，又连续两天组织演艺人员上街，表演抗日节目。

1932 年 1 月 28 日，淞沪战争爆发。3 月 3 日嘉定县一度沦陷。日军侵占嘉定后，在境内大肆烧杀抢掠，并大举焚烧图书。在南翔，尽取南翔公学图书馆之图书堆积广场中，举火悉焚之（1932 年 5 月 20 日《新闻报》），据 1932 年 8 月 1 日《嘉定新声》报道当时嘉定藏书最多的公共图书馆系奎山民教馆和县教育会合办的嘉定县教育会图书馆，被日寇毁损图书 5000 余册，全县各学校的图书几乎丧失殆尽。

为了尽快恢复嘉定各图书馆的借书阅览功能，奎山民教馆会同教育界同仁，人人捐款，购置图书，以扩充馆藏图书。1932 年 10 月 1 日，县教育会图书馆已恢复开放。嗣后，各乡镇民教馆阅览室及学校图书馆都陆续开放。

1932 年 10 月 27 日、28 日，奎山民众教育馆邀请上海少年宣讲团到嘉定作抗日演讲。演讲会结束后，又在孔庙大成殿前放映十九路军抗日的新闻片。

1932 年 11 月 22 日。奎山民教馆发出倡议，为不忘国耻，激发民气，征集纪念品，筹设“3·3 纪念馆”。社会各

界名流一致表示赞同。为了迎接元旦，奎山民教馆还组织嘉定书法家们撰写了新年抗日楹联 2000 余幅，并印制有抗日内容的日历 4000 余份分赠嘉定民众。

1933 年 2 月 1 日，在嘉定沦陷一周年前夕，“3·3 纪念馆”正式开放。馆内陈列有揭露日军侵略嘉定时烧杀抢掠的照片、被毁坏的房屋模型，以及揭露伪“嘉定维持会”媚外投敌的书信等，计有展品 300 余件。该馆还编辑出版了《嘉定 3·3 纪念册》一书，历述沦陷前后的情况和日军的暴行。

1937 年 5 月，奎山民教馆在孔庙承办了本县著名爱国画家沈逸千的《蒙绥画展》，沈逸千曾在我国西北地方游历作画，除了描绘祖国大好河山外，还创作了大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有关绘画。《蒙绥画展》中，有一幅《陷贼女图》，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侵略，此画还配上了胡厥文先生的长诗，十分引人注目。

此外，徐行民众教育馆，曾会同徐行中心小学，于 1931 年 10 月 14 日举行抗日演艺会，演出精彩成功，引起全场观众的高昂激情，是嘉定乡镇中较为突出的一次抗日演艺。

进步文化社团的抗日救亡活动

20 世纪 30 年代，嘉定有较多的文化社团。其中“微音社”、“嘉定青年文化促进会”、“廖北青年文化协进会”、“嘉定树学社”等进步色彩最为显著，抗日救亡的倾向最为鲜明。

微音社成立于 1931 年 7 月，由南翔公学一批进步青年

教师和进步学生组成。社名取“人微言轻”之意。该社在主要骨干陆象贤家办起了小图书馆，刻印磨砺抗日救亡意志的《图书介绍》分发给社员。1936年11月26日，微音社在《太嘉宝日报》上发表《微音社救国宣言》，主张：“一、我们应该联合起来。过去的思想、主张或许会有不同，但现在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救国；二、在可能的范围内组织健全集团；三、运用这个集团的力量来督各当局注意救国工作，在民众中宣扬爱国主义，蔚成民族解放运动”，这在当时是较为成熟的一个宣言。微音社社员们曾多次募款购置御寒必需品给前方将士。

嘉定青年文化促进会成立于1931年12月。由进步知识分子瞿白音、葛一虹和田鲁等人发起。会员大多为大中学生。

“1·28”事变发生后，该会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从事宣传和救济工作。1933年学校放春假期间，该会在孔庙举办反帝抗日图画展两天。该会还组成了“暴风雨剧社”，创作演出。同年4月5日、6日，由该会主要骨干瞿白音、葛一虹出面，通过左翼剧联的章泯，邀请陈鲤庭带领上海骆驼演剧队的成员左明、徐韬、王为一、高原、姜敬舆、朱铭仙等30余人到嘉定，与暴风雨剧社在孔庙搭台演出。骆驼演剧队演出了《帝国主义的狂舞》、《高尔夫速写》、《谁是朋友》、《梅雨》、《到前线去》、《放下你的鞭子》及《6·23》等7个话剧；暴风雨剧社则演出了由瞿白音、葛一虹、田鲁3人

联手创作的话剧《转变》和《嘉定 3·3》。《转变》是独幕话剧，内容描写一个青年为恋爱苦闷，后在火热的抗日救亡斗争中觉醒，奋起投身抗日运动。这个话剧后来更名为《改弦更张》，曾到上海演出。并由他们 3 人自己掏钱出版了单行本。《嘉定 3·3》是揭露日军 1932 年 3 月 3 日侵略嘉定暴行的活报剧，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强烈的宣传效果。骆驼演剧队与暴风雨剧社成功的联合演出，激发了嘉定人民抗日救亡的高度热忱。演出时，台上台下“掌声雷动，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等口号，民气激昂，实空前盛举云。”（1933 年 5 月 1 日《嘉定新声》），1936 年 2 月，该会葛一虹在《太嘉宝日报》上发表《国防戏曲作者的任务》一文，就抗战的戏曲阐述自己的观点。

此外，“嚆北青年文化协进会”、“嘉定树学社”等文化社团也都开展过抗日救亡的文化活动。

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文化活动

嘉定是一座英雄的城市，素称不屈之地。嘉定人民具有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这个传统必然融入文化。每至国家危亡之秋，明代中叶的抗倭斗争和明清易代之际的“侯黄英烈”往往成为新的热点话题 赋予新的时代色彩。

“1·28”事变后，嘉定社会各界的抗日救亡热情极其高涨。其中教育界尤为突出，就连国民党县党部也受到民众抗日热情的感染，在 1934 年 3 月 3 日嘉定沦陷两周年时，

由县党部召集社会各界举行了隆重的“3·3”纪念仪式。

当时，重印嘉定先贤们反倭抗清斗争的书刊史料，借以张扬民族志气，成为一种时尚。1933年6月，嘉定县初级中学自治会重印了反映嘉定人民抗清斗争的史料笔记《屠城惨史》。同月，嘉定县新志编纂委员会重印了抗清志士侯峒曾的著作《侯忠节公全集》。

1934年8月，嘉定县新志编纂委员会通过决议，“以发扬民族精神为宗旨，表扬事迹为三忠祠、叶池、陶庵留碧、石童子四处”。并决定“由教育局编入乡土教材，以资深入儿童脑海，先哲靖难日期，应为纪念日，嗣后每逢纪念日应由党政机关、学校团体召集于上列地点，举行纪念式，以资景仰。”（1934年8月30日《嘉定新声》）

1936年初，由县教育局杨师曾倡议，在汇龙潭东筹建纪念抗清志士侯峒曾黄淳耀的侯黄纪念碑，在西城塑抗倭无名小英雄石童子像。号召全县教师学生捐款建造侯黄纪念碑和石童子像，师生们热情高涨，“全县教育人员及学生无人不捐款，即使是穷苦小学生亦捐助铜元一枚。教育人员捐款571.45元，学生404.64元，连整存利息已满千元”（1936年11月1日《嘉定新声》），是年11月，由前清举人黄世祚撰文的侯黄纪念碑及由雕塑家浦泳设计的石童子像（另树石童子碑，碑文也由黄世祚撰），分别竣工。

1935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自治”，华北

各大学学生奋起罢课抗议。嘉定县立中学学生也于是年 12 月通电声援华北学生。12 月 30 日，县立中学全体学生手执标语旗帜，在全城厢镇游行，学生约 600 余人，至公共体育场。“一路肃然，居民莫不感动。”嘉定声援华北爱国学生运动大会的“会场空气紧张而热烈”（1936 年 1 月 1 日《太嘉宝日报》）。会后，还分组步行到石冈、徐行、娄塘、马陆、南翔、外冈等地宣传演讲。并向县党部提出 大要求：一、请求政府实行革命外交；二、请求政府下令讨逆；三、请求政府保全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四、请求政府切实保障学生爱国运动；五、请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集会自由。这次学生爱国救亡运动规模之大，影响之深是前所未有的。

年 月 日，南翔孔学会为发扬孔子武勇的思想，张扬民族精神，特请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进步文化社团 一新安旅行团在十九路军纪念地放映新闻专题片

战地写真》及《民族痛史》、《抵抗》等宣传抗日救亡的电影，观众多达数千人。

林林总总的报刊文章

20 世纪 年代前期，是嘉定报刊发展的黄金时期，仅 1930 年、1931 这两年中，全县就创办了 32 种报刊。其中《嘉定青年》、《大众月报》、《寥北月刊》、《灯塔》等都十分鲜明地提出了抗日救亡的口号，成为主流的舆论导向，在当时十分引人注目。这些报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者，都是一些民族

意识十分强烈，又深受左翼文化运动洗礼的热血青年，如瞿白音、葛一虹、田鲁、梅休、潘世和等人。这些报刊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深重的民族危机必然触发人们对历史的深刻反思，而代表嘉定人民反侵略的抗倭斗争以及悲壮的抗清斗争，自然成为旧话重提的主要内容，人们希冀从历史的武库里寻找合适的武器。

《嘉定青年》于 1933 年 1 月 10 日创刊。它是嘉定青年文化促进会的刊物。由葛一虹、田鲁编辑，以“促进本邑文化”为宗旨，第一卷第一期就以“激发民气之文字，勇敢纯洁，令人钦佩”（1933 年 2 月 10 日《嘉定新声》）。是年 3 月 3 日出版的第一卷第二期，观点更加鲜明，鼓动性更为激烈，《3·3 周年记》一文中，直言不讳地提出“打倒一切不抵抗和妥协的帝国主义走狗”，表示对政府不抵抗主义的强烈愤慨。该期还刊出了《冯开生访问记》一文，由葛一虹、田鲁共同创作，通过采访汉奸冯开生，深刻揭露了汉奸卖国求荣、危害人民的丑恶本相。时人称这本刊物“能言人所不敢言，诚邑内唯一纯洁之刊物也”（1933 年 3 月 11 日《嘉定新声》）。

《大众月报》于 1933 年 1 月 1 日创刊，奎山民教馆发行。该刊第 4 期上有《石童子》（十八公）、《严家兵平倭记》（零落君）、《倭祸回忆录》（北文君）等 3 篇题材相同的文章。借古讽今，激发读者抗日救亡的热情和勇气。

此外，《寥北月刊》创刊于 1933 年 7 月，由北青年

文化协进会编辑发行，潘世和、梅休主编。以及《灯塔》，创刊于 1931 年 10 月，嘉定树学社编辑发行。它们都曾刊登大量的抗战文字，在嘉定读者中有较大的影响。

1937 年 7 月 7 日，抗战全面爆发。同年 8 月 13 日，淞沪抗战爆发。嘉定又处于抗战的前线。嘉定的抗日救亡文化活动，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而掀起，又因嘉定的沦陷而跌落。

文化名人在嘉定的活动

“8·13”上海抗战爆发后，文化名人对抗战表现出高度的热情，纷纷奔向战火纷飞的前线。嘉定作为上海抗战的前线，有许多著名文人曾到嘉定活动过。

1937 年 9 月 19 日，著名女作家谢冰莹穿上军装，当上了“女兵”，随军开赴抗日前线安亭、外冈一带，她在外冈写作了《战地中秋》一文，文中说：“为参加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而牺牲，是最光荣的。”此文后收入她的散文集《新从军日记》。

1937 年 10 月，上海左翼兵团总司令陈诚请郭沫若筹组战地服务团。郭沫若返沪后，在中共上海党组织的筹划下，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出面组织战地服务团，开赴嘉定、南翔一带的前线部队、伤兵医院、农村，用歌咏、演戏等各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募捐和救护等战地服务工作。

10月24日、25日，郭沫若、田汉、夏衍来嘉定，访问在前线作战的罗卓英将军。郭沫若、田汉、罗卓英分别作诗数首，歌颂抗日救亡。田汉在《新战线巡历——从嘉定归来的一个报告》一文中，记述了这次访问的情况。诗歌及访问记均刊于当时的《救亡日报》上。

1944年春，南翔惠民中学校长陆象贤邀请著名鲁迅研究家、杂文家唐弢到校作如何学习和理解鲁迅杂文的专题讲座。

战火中的报刊

“8·13”上海抗战爆发后，嘉定的报刊都刊登了大量的抗日文章，旗帜十分鲜明。

1937年出版的《嚆北月刊》（7月号）上第一篇文章就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开始了》的长文，署名“牛何之”（即主编潘世和）。文中指出：“不抵抗，国家要灭亡，人民要沦为亡国奴。全面抗战必将开始，人民要认清形势，一致起来抗日”。

“8·13”上海抗战爆发后，嘉定教育界人士闻风而动，组织了“嘉定教育界战地服务团”。他们为抗日军队引路、刺探情报，活跃于枪林弹雨中。此外，他们还办了周刊《抗战的嘉定》，由爱国教师、报人吕舜祥主编。该报旨在提高嘉定民众的爱国热情，支援抗日前线。

嘉定沦陷后，日伪政府加强了舆论统制。除日军特务部

嘉定班外，伪嘉定县公署第一科及伪县政府第四科均是监控报刊的机构，对舆论进行了严厉的控制，必须经过他们的同意，才能公开发行相关的报刊，同时他们还重点扶植了一批汉奸报刊。

地火在地下运行。1941 年，嘉定还出现了抗日地下报刊。嘉定南部真如镇，有一份《真如青年周刊》，它是由国民党地下真如区委书记李树滋主编。该刊以“联络感情，砥砺志气，抗战建国，反对敌伪”为宗旨。这份周刊常常秘密贴在墙上，鼓舞了真如地区中国人的斗志。

抵制奴化教育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长期统治中国的目的，在沦陷区进行奴化教育。当时规定，全县中小学生必须学习日语，不准学英语。而师生们大多具有爱国思想，对日本帝国主义硬性规定的奴化教育十分反感，千方百计予以抵制。

1942 年 9 月，南翔惠民学校的教师练又新在上课时当场撕毁汪伪政府编印的所谓“国定教科书”。改用自己油印的《正气歌》、《满江红》，以及开明书店出版的活页文选和《古文观止》等。（见《嘉定文史》第 11 辑《南翔旧闻》）

嘉定勤业中学的日语教师仓持仁一，规定每次上课前要求学生全体起立，高喊日语“哭拉玛基生三，空我泥几洼”，意思是仓持仁一先生，您早！但全班学生却利用嘉定方言，喊成了“赤佬麻子先生，空我二斤麦！”，幽默地发泄对日本

侵略者的憎恨。勤业中学的同学对日语课都非常厌恶，从而消极怠学，考试成绩多数不及格。（见嘉定勤业中学校友会编《青春回眸》）

坚守气节的文人

嘉定素称“复仇之地，而非温柔之乡”，文人大多有气节，无媚骨。

曾为《侯黄先生纪念碑》及《石童子碑》撰文的前清举人黄世祚。“8·13”上海抗战爆发时年已 67 岁。嘉定沦陷后，日伪多次遣人要他出山，“维持地方治安”。黄世祚改名“练西劫余叟”，蓄发留须，托病隐居，足不出户，拒不接受。后上海日本侵略军专程指派一头目“登门拜访”，威胁说：“在下能理解黄先生，但是，恐怕我部下不会理解你……”凶相毕露，但黄世祚视死如归，不改初衷。伪县知事冯诚求上门，黄世祚知道来意先发制人说：“先生今来叙旧，我欢迎。但不要提及政事，我自嘉定沦陷后，没进过城，成立维持会后，未出过家门。”黄世祚大义凛然，使冯诚求自讨没趣。时上海《文汇报》以《疾风知劲草》为题，赞扬其高风亮节。1942 年，黄世祚病逝，县内各界人士数百人，汇集孔庙明伦堂悼念黄世祚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

曾任嘉定一区区长的书法家浦泳在嘉定沦陷后到“孤岛”上海避难，多次拒绝日伪政府的拉拢。为生计，他以“长发头陀”为别号，以鬻书卖艺为生。技艺益发精进，著名作

家郑逸梅先生在《艺林散叶》一书中写道：“海上有鬻书者，名长发头陀，人不知其真姓名，其实姓浦名泳。”

实业家、诗人胡厥文在“1·28”事变中日以继夜为十九路军集制军品，补其不足。数十日须髯盈颊，群疑为留髯，当答之曰：“未逐倭奴，不容除剃。”直至14年后，抗日战争全面胜利才剃去。因作《薙髯乐》长诗一首，诗中说：“一片江潮杀倭声／吾心跃跃如花放。”“送军前／与敌抗／如醉痴／须髯长／或怪吾于腮／吾云剃除还待失地恢／”诗句中充满了斗争精神和乐观主义情怀。

嘉定的抗日救亡文化活动，在嘉定造成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还造就了一批人才，他们以家乡的抗日救亡活动为出发点，走上革命道路，走上波澜壮阔的人生大舞台。瞿白音、葛一虹、田鲁等人从家乡的抗日救亡文化活动开始，参加左翼文化运动，后来成为中国话剧史上著名的“嘉定话剧三杰”，他们都成为活跃在戏剧电影领域内的著名作家、艺术家；陆象贤以在家乡的抗日救亡文化事业为起点，成为孤岛杂文家、诗人，后来又成为工运学者；潘世和从家乡的抗日救亡文化事业出发，后来从事文艺创作、教育工作，成为一名出色的共产党员；浦泳积极从事民主政治活动，组建中国民主同盟上海支部嘉定小组。又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和书画金石的创作活动，成为一位知名文化人。

同舟共济在南翔

陆象贤

一、向南翔转移秘密文件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被称为“孤岛”的上海租界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这一天早晨，我照常到四川路桥堍上海邮政管理局上班。中午回到新闸路寓所吃过午餐后，前往法租界的私立树民中学教物理和地理两节课。我走到西藏路、南京路口时，忽然发现几个日本兵拿着上了刺刀的枪站在路口两旁。我一看情况不对，立刻回到寓所。当时，我无法对外联系。首先想到的是，把我家里中共江苏省委工人运动委员会的秘密出版机构——北社的痕迹销毁掉。当时，我的妻子和女儿住在南翔，在上海寓所只有我一个人。我把北社出版的各种书刊存书清理出来，约有几百本，其中有我的杂文集——刚印成的《两极集》，还没有全部发出去，还有我化名“列御寇”主编的《北斗》杂志第二期（9 月份出版）卖剩的刊物。这一期《北斗》转载了毛泽东在延安的《辩证法唯物论》讲稿和北社整理的《苏维埃运动中各项政策》一文。我用一个烧炭火的盆来烧书，可是在盆里一张一张烧书稿容易，烧整本书就不容易了，而且闪闪的火光也会引起邻居的注意。我看一时烧书不成，就奔向北社在法租界马浪路（今为马当路）的秘密存放党的历史资料的地方，

那里是 1941 年夏北社创刊《北斗》杂志，发表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历史资料，为了安全地进行这项工作，我们在马浪路的一条弄堂里租了一间亭子间，作为保存和整理资料的地方。我眼看日军占领了租界，这个秘密地点不能再用，必须将这些秘密文件立即转移。我就冒着风险将这些秘密文件取回寓所，改装成一包邮寄印刷品。当天晚上，我原定去设在福州路生活书店楼上的华光戏剧专科学校教课讲《艺术论》。也不得不放假了。第二天一早，我在上海邮政管理局上班时，通过上海邮局中的地下党员、邮件分拣员利用日本检查员不在的空隙，将这包“印刷品”发往南翔惠民学校胡训谟收。我又在上海邮局找了一位熟识的信差，来我家把北社的存书装在麻袋里带出去处理了。

过了 5 天，是星期日休假，我到南翔惠民学校与胡训谟会面。知道他已经安全地收到这包“印刷品”，并且用油纸包好放在煤油箱内，在惠民学校的一间小屋里挖了一个坑，把煤油箱埋了起来。我的紧急措施，事后得到了领导的同意。因上海环境的变化，北社停止了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惠民学校旧址已盖起了工厂，我请胡训谟去寻找埋煤油箱的地方，他已经认不出来，只好作罢。

这段不寻常的往事，时隔 60 年多，所以重提，因为现在知道我国苏维埃运动的人很少了，可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革命政权 借鉴俄国革命经验 也称“苏

维埃政府”从 1931 年 11 月到 1937 年全面抗日战争前夕，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为工人、农民专政的国家，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这是在我国近代革命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期，是难以忘怀的。

二、胡训谟两次掩护汤世英

解放前，在白色恐怖严重的岁月里，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发现处境危险的地下党员，在一时没有地下交通员护送到苏北、浙东根据地的紧急情况下，则就近安排到南翔避难。1946 年和 1948 年，胡训谟两次掩护从上海撤退下来的地下党员汤世英。

汤世英是沪东棉纺一厂的工人群众领袖。抗日战争胜利后，她与工人兄弟姐妹以讲形势、讲故事、学唱歌等形式，联系群众，把工人组织起来。为了争取改善待遇，发动群众同日本资本家斗争；为了要求解冻生活指数，拉起工人队伍，到国民党市政府社会局与伪局长进行面对面的斗争。1946 年 3 月，她组织沪东棉纺女工群众参加国际三八妇女节集会、游行。当时，国民党正在筹备召开伪国民大会，沪东女工群众在三八节纪念大会上提出“女工也要参政，参加竞选代表”的口号。当天晚上，沪东女工在大康纱厂举行大会，自选“国民代表”候选人。汤世英被选为“国民代表”之一。为“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要求民主”，1946 年 6 月 23 日，汤世英带领沪东女工队伍，到北站欢送“上海人民和

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因此，国民党特务将汤世英列入黑名单。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发现汤世英处境危险，通知她立即撤退。7月，她在襄阳路襄阳公园与浦东大团武装部的陈志亚接上关系，陈让她化名陈志毅，与自己以兄妹称呼。两人从真如乘火车到南翔，寻到西市梢的滕家村胡训谟。胡训谟就安排汤世英与他的女儿同住，以他主管的滕村小学的代课教师为掩护。这时，国民党特务抓不到她，就在国民党办的《铁报》上扬言通缉汤世英。1946年暑假，安亭“昆青嘉”三县简易师范招生，青浦武装部的沈志清（顾复生的外甥）通知汤世英考三县简易师范进修班，开辟新的工作。她入学不到两个月，沈志清在青浦被捕，党组织派杨乃迪通知汤世英立即撤往苏北。当时苏北地下交通员还未回沪，情况紧急，汤世英就投奔四川省广元县父亲处。将近半年，她接到杨乃迪的通知：“速回原地”。于是汤世英从四川乘船到南京，改乘火车二次到南翔找胡训谟。由于劳累过度，加上一路上的辛苦，她到滕家村就病倒了，突然大口出血。幸亏有村上的群众护送她到上海兆丰路红十字医院抢救治疗，才转危为安。上海地下党组织派陈伯亮到医院探望，支付了住院费用。汤世英出院后，仍回滕家村休养。上海解放前夕，汤世英接到金佩扬通知：“上海解放，即回原厂”。上海解放后，胡训谟为汤世英转组织关系，介绍她到青浦朱家角武装部取得组织介绍信，前往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将组织关系转到中纺九